

主编 王晓明

大众传媒与上海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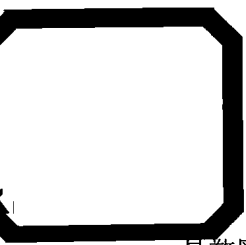
吕新雨 等著

研究坊

热风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众传媒与上海认同

吕新雨 等著

主编 王晓明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传媒与上海认同 / 吕新雨等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3
(热风·研究坊丛书)
ISBN 978-7-5458-0540-6

I. ①大… II. ①吕… III. ①大众传播—传播媒介—关系—区域文化—研究—上海市 IV. ①G206.2②G1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8943 号

责任编辑 马 睿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大众传媒与上海认同

吕新雨 等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25,000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540-6/G·38
定 价 30.00 元

序 言

大众传媒是历史的舞台,它本身也是历史中的重要角色。基于这样的双重理解,在本文集中,我们希望把历史研究、传媒研究和城市研究融合在一起。城市,尤其是上海,是中国大众传媒的发源地,也是它的根据地,一座城市的自我想象是需要大众传媒的运作来完成的。这样把分属不同学科的课题融合在一起,是希望对传统的大众传媒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做一些突破性的尝试;也就是不仅仅从大众传媒的内部来理解大众传媒,而是希望把大众传媒内与外的关系结合起来进行讨论,特别是将之置放在一个历史的脉络里。

首先,我们通过大众传媒的舞台来透视社会的变化,不同的社会力量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粉墨登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就是历史的展开,它们在大众传媒的历史镜头面前是如何亮相并且被定格的?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方法是尽可能回到原始材料,直接去阅读老报纸、老杂志等,以期回到作为文本的历史“现场”。在这个返回的过程中,要完成对文本的解读,是既需要研究者有较好的理论建构,又需要尽量避免用后设的概念简单地裁剪史料。研究者需要把自己既有的观念建构成一种与史料的对话关系,在这样一种对话与互动的关系中,不断地修正和校订既有的观念,也不断地发掘史料的意义,从而使史料本身获得鲜活的再现,以此透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发展,并检讨理论自身的解释力量。我相信,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与历史的对话关系,才能使研究对象本身的活力被激发出来,才能使理论之树常青。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避免大众传媒被理解成单纯的被动的镜子,或

者空洞的舞台,我们需要更多地立足在大众传媒本身的能动性上。大众传媒本身作为历史的“舞台”是如何被搭建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在介入这个搭建的过程和方案,这既决定着观看和理解社会的视角,也决定着怎样的人群能够被召唤成为舞台上不同的演员和角色。这依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在一个拉长的历史时段里,才可以看到不同历史力量的此消彼长。因此,我们特别重视一个历史视野的建构。只有在—个历史的视野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大众传媒自身的主体性变迁的过程,而不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固定的没有变化的模式。因为大众传媒自身的主体性是和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变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存在。

本文集以上海为聚焦,不仅仅是把大众传媒作为上海的一个定语,也是希望把它看成是上海研究的一个方法,是通过大众媒介的方式来理解和触摸上海。通过分析上海人的自我认同如何经历着不同的历史变迁,在这个变迁过程中不同的认同如何被大众传媒所塑造和传播,来探讨认同、大众传媒与—座城市历史的关系,而这座城市的历史本身又是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的重要场域。因此,这座城市的历史是内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的,是晚清以来中国和西方交汇的锋面,因此它也是世界风云聚会的所在。因为这样的历史脉络,上海的大众传媒有过辉煌的发展历程,占据了—中国大众传媒的半壁江山。本文集里讨论的既有大众传媒、上海认同与石库门这样的社会空间的关系,也有大众传媒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大众传媒与社会性别角色,以及大众传媒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上海人”的关系;我自己的研究则集中于当代上海城市变革中的个案,并试图在—个城市与乡村相互联系的历史视野中展开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意识地希望打破—单一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上海想象的叙述,而是更多地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来展示上海多元而变动的认同资源。当然,这里呈现的只是—一个初步的跨领域的尝试,涉及的范围是有限的,特别在处理长时段的历史资料时,限于篇幅和学科视野的局限,很难避免简单和疏漏——在我们的期望和

实践之间,还有着种种距离。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克服。这里,也期待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本文集是由我和我指导的研究生共同完成的,感谢她们的辛苦和努力。其中,李静做了很多通稿的工作。本研究属于王晓明先生主持的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计划,并且得到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吕新雨

2008年3月31日上海

目 录

序言 吕新雨

- 1 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
李 静
- 65 大众传媒与上海工人阶级主体性建构及变迁 邵旦丹
- 118 大众媒体与“上海男人”——上海男性气质的历史变迁
王颖曜
- 142 摩登印象——大众传媒与上海“女性气质角色”的历史变迁
李佳佳
- 195 大众传媒与晚清以来“上海人”的历史变迁(上篇) 郭 男
- 240 大众传媒与晚清以来“上海人”的历史变迁(下篇) 冯秋瑜
- 286 “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关于电视纪录片
《毛毛告状》 吕新雨

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 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

李 静

一 引 言

人构造出空间,而空间也反过来塑造人。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其 1974 年的著作《空间的生产》中,力图纠正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于空间的简单和错误的看法,他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在他看来,整个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空间的重组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他认为空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不久,米歇尔·福柯作了《地理学问题》的访谈,他同样注意到了空间的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命运,空间长期以来一直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成为了与时间及其所代表的丰裕性、辩证性、富饶性、生命活力等相对立的观念。福柯 1984 年发表的《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一文认为,20 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这与 19 世纪的时间性特征恰好对立^[1]。

今天,“空间”一词已经成为现代都市研究中一个瞩目的概念。本文即是从石库门住宅这一上海独有的建筑空间入手,解剖大众传媒对石库门的建构,意图一窥“上海人”这一群体的某些特征及其历史流变。

石库门住宅,指住宅单元出入口采用石库门式样大门的住宅。上

海的石库门住宅起源于 1870 年前后,其正面大门一般采用花岗石或宁波红石(砂岩)作门框,配上两扇黑漆厚木大门与一副铜环或铁环。这种住宅的特点是群体布局紧凑,相互毗连,成片纵向或横向排列,其单体平面及结构则是继承中国传统江南民居四合院的形式。它最初出现于英租界,其后流传于上海老城厢内外及近郊一带,几乎遍布全市大小弄堂,成为上海民居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到 1949 年上海解放时,这类住宅多达 20 万幢以上^[2]。

上海是一个移民的城市,石库门则是移民的住所。作为近代上海人生息繁衍的空间,石库门是了解上海人来历、特征以及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钥匙。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1 世纪初,上海石库门从最初的富人、中产阶级住宅到 20 世纪上半期“七十二家房客”的栖身之处、“亭子间文人”的暂居之地,再到解放后的大杂院,直到今天成为上海边缘人群及弱势群体的聚居地,其产权、空间特征及居民的自我身份认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空间与产权变迁的线索,本研究将上海石库门住宅的演变过程大致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一, 1870 年—20 世纪 20 年代: 石库门住宅应上海移民城市的需要而诞生、发展的时期。它是外国资本构造的空间,最初是为了迎合因战乱等各种原因涌入上海租界的移民需要而修建。

二, 20 世纪 20 年代—1949 年: 石库门的繁荣与分化时期。1927 年“上海特别市”成立,摆脱县级单位身份而正式有了上海市之名,这一时期是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并繁荣发展的时期。石库门产权日趋复杂,空间格局发生改变。它在大众传媒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展现出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三, 1949 年—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石库门空间的演变时期。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带来政治、经济上的深刻转折,上海的石库门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时代大潮之中,其产权、空间分割、居民身份都起了很大变化。

四,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当前: 石库门的衰亡时期。

1989年,上海市政府提出住房制度改革的设想,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建成4000万平方米住房,逐步改善上海市民的居住条件。随后确定拆除3000万平方米危棚简屋,再增建1500万平方米住房^[3]。这启动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批租、石库门拆迁与商品房开发,也使石库门里弄及石库门居民迅速被边缘化。

本文主要选取1872年—1882年《申报》、1932年《申报》、1949年《解放日报》、1958年3—6月《新民晚报》“里弄整风”系列报道、2002年1月—2003年7月《新民晚报》进行分析,定量与思辨方法相结合,兼顾电影、电视、书籍等媒体。其中,选择《申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为主要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两种报纸是不同历史阶段中富有上海本土特色的主流媒体。1872年—1882年是《申报》初创,也是石库门最初诞生的时期。1932年,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社会各阶层矛盾与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时期,也是《申报》自身政治立场有显著转变的时期,这些因素,都或隐或现地反映在石库门相关报道中。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使石库门产权与石库门居民的身份特征发生了剧烈改变,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相当直接地反映了这个过程。1958年的“里弄整风”运动是建国后历次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对象则是上海的“里弄居民”,非常具有针对性。《新民晚报》对此的系列报道,集中地表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对石库门居民的主体性建构。2002年至2003年,则是在本研究着手时最接近当前的时期。

本文运用空间地理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传媒理论、身份认同理论等若干原理,力图探索上海开埠这100多年间,大众传媒是如何塑造上海石库门以及石库门中的居民形象,赋予石库门怎样的个性,选择、重复怎样的主题,以及隐藏、压抑了哪些因素,以此探索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变迁与现状。本文还将关注这一过程中传媒扮演的角色,它自身如何迎合、裂变和挣扎,在这一舞台上哪些力量在支配、表现、斗争。但由于篇幅与理论水平所限,有些问题并未充分展开讨论。

二 开埠之初：石库门的构建与上海人的起源 ——19 世纪晚期《申报》的石库门广告分析

（一）大众传媒中最早的石库门

“石库门”一词最早在大众传媒上出现，不是作为新闻，而是广告——不管是 1872 年《申报》上最早的石库门广告，还是房地产巨头沙逊家族 50 年不变的石库门广告。这时的石库门在大众传媒中仅仅作商业信息而出现，还远远不是文化意义上的。

在《申报》上可以看到的最早一则石库门广告是（标点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房屋出租》：启者今有新造厅式楼房一所在石库门内，计十幢，四厢房，后连平屋五间，坐落石路中三元轩街内。倘有贵客欲租者，即请至老闸养德药铺间壁街内向本号面议可也。九月二十七日洪元成谨启。（图 1：《申报》，1872 年，第 165 号。）

而老沙逊洋行在《申报》上的第一个石库门广告为：

启者本行今新造市房一所，在宁波路兴仁里西首朝南，石库门六幢，每幢计六楼六底两厢房，后连披屋三间，井俱全。准于明年二月中旬可能完工，其租价格外公道，倘欲先为租定者，请至本行经租帐房面议可也。特此布闻。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老沙逊洋行启。（图 2、图 3，《申报》，1872 年，第 206 号）

我们可以看到，十年之后 1882 年的《申报》上，老沙逊洋行的石库门广告仍没起什么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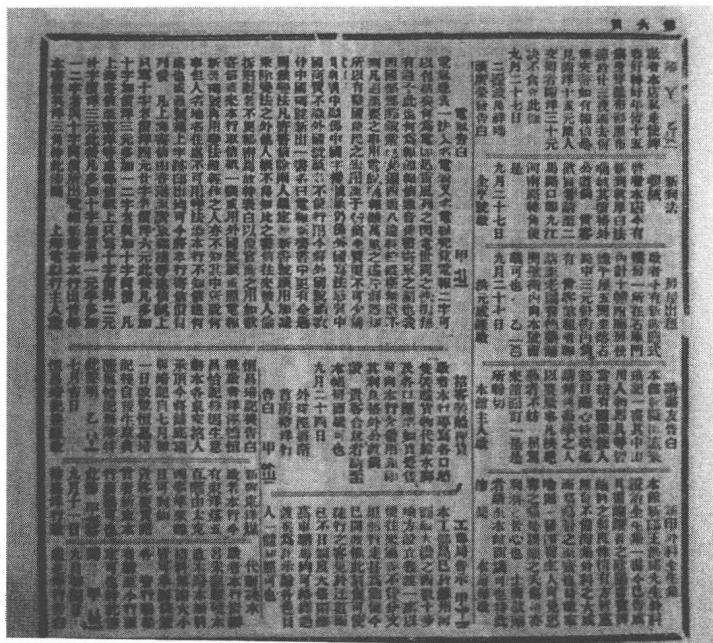


图1 《申报》上刊登的第一个石库门广告,本文作者拍摄。

《召租》:兹在河南路恒德里内朝南石库门一所,计六楼六底两厢房后连披屋晒台水井俱全……如有意者,租价便宜,特此布闻。老沙逊经租帐房启。(图4,《申报》,1882年,第3118号,第5页)

随着时间流逝,石库门出租的规模越来越大,例如这一则《房屋招租》:

今有在老闸西、保康里北,博经里新造市楼房六十余幢,石库门楼房四十余幢,晒台、后披、井俱全,租价起码每幢洋二元五角,余者格外公道。倘欲租者,请至博经里口庆记经租帐房订租可也。(《申报》,1882年,第318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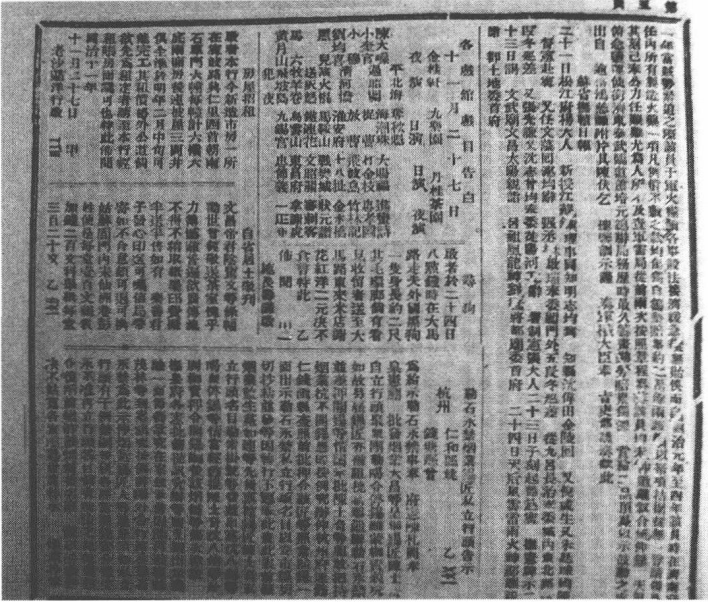


图2 1872年老沙逊洋行在《申报》上刊登的第一个石库门广告,本文作者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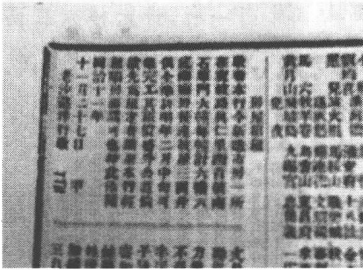


图3 图2细部。

从以上这些最早的石库门广告，可以看出石库门建筑的一些初始特征：

其一，石库门被建造的目的就不是业主自己居住，它是由房地产商大批建造并出租牟利的。这点与其他中国传统建筑先就有了根本区别，它是上海近代住宅商品化的开端。

其二，它是由外国资本构筑的空间，虽然也有中国的官僚、富商、地主、买办资本参与其间，但主体一直是外国资本。据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以后，在上海从事房地产经营的洋行有：老沙逊、新沙逊、怡和、仁记、兆丰、公平、太平、通和、德和、有恒、泰来、荣康、孟吉礼、永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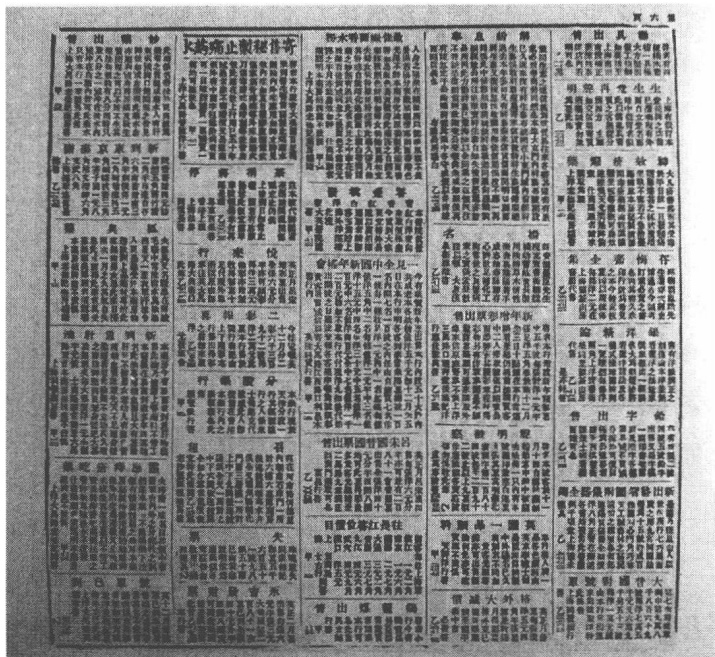


图 4 1882 年《申报》上老沙逊洋行的石库门广告,本文作者拍摄。

长利、元芳、和记、裕盛、隆茂、锦名、字林等等。以沙逊家族为例,1880年起已是现南京东路房地产第一大户,这一纪录保持达 35 年之久。在 1877—1900 年期间,新沙逊洋行占有 29 处产业,土地面积 364.449 亩,为上海房地产商中第一把交椅^[4]。

其三,石库门的经营,遵循近代房地产业运作的规律,一开始就与大众传媒相联系。石库门在大众传媒中首先是作为商品而存在,而且很长时间内仅仅是作为商品而存在。

(二) 早期石库门空间特征与上海人自我认同的起源

石库门住宅空间构造最显著的特征是:中西结合,具有强烈的半殖

民地城市的烙印。它是我国传统居住方式和西方城市房地产经营方式相结合的产物。

早期石库门的单元平面基本脱胎于我国传统民居中三合院或四合院的住宅形式,主要部分为两层楼,后部附属房屋则为单层。它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我国传统民居中封闭式深宅大院的样式,但面积尺度大大缩小,空间变得局促紧凑了。如图 5 所示,它在纵向布置上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平面是对称布局。进门后首先是一个方整的天井,虽然无法在住宅中留出大宅院,但这个天井也就充当了传统住宅中庭院的作用,使紧凑、局促的住宅空间增加了一些通透感。正对天井的是客堂间,有可拆卸的落地长窗面向天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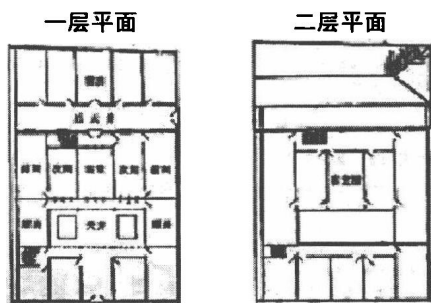


图 5 兴仁里住宅平面图,罗小未、伍江:《上海弄堂》,上海,上海美术出版社,1997: 11。

客堂一般阔约 4 米,深约 6 米。中国传统庭院中最主要的空间是厅堂(普通民宅中称为堂屋),它比西方居住建筑中的起居室多了一种礼仪空间的功能。因而这一空间除必须处于中心位置,便于生活起居以外,更应是一种正式、庄严的场所。在石库门弄堂住宅中的客堂间即是如此。它既有家庭生活中日常起居空间功能,又可用于家庭聚会、婚丧礼仪、节日喜庆等正式活动^[5]。

石库门客堂的两侧为次间,天井两侧为左右厢房。客堂后面为通向二楼的横置单跑木扶梯,再后则为后天井。后天井的进深一般为前天井的一半,且有水井一口。后天井之后是单层的灶间、贮藏间等附属

用房。前楼、后楼,正房、厢房的排列,无不反映出中国传统家庭中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特征。

石库门建筑最大的特征莫过于沿弄道一面的“石库门”了。沿弄道一侧的立面,一般由石库门院墙和两侧略高的厢房山墙组成,形成一个基本封闭的外立面,这使住宅基本保持了中国传统住宅建筑对外比较封闭的特征,虽然身居闹市,但关起门来也可“一统”。正面即开有“石库门”。早期的石库门一般比较简单,仅为一简单的石料门框,内配黑漆厚木门扇。稍晚一些开始注重门本身的装饰,使其成为上海弄堂的醒目一景(图6)。



图6 石库门住宅正面,罗小未、伍江:
《上海弄堂》,上海,上海美术出版社,1997: 149。

上海的石库门建筑空间演变趋势之一是:随着城市地价上涨,单元面积越来越小。早期石库门建筑的空间固然不能与传统的中国庭院式建筑相比,却比后期的石库门宽敞许多。它的设计是面向传统中国家庭的,适合中产阶级安顿全家两、三代人口,当时主要是适应从江浙一带到上海逃避战难的地主、乡绅、富商、官僚的需要。这种布局方式基本能满足中国家庭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居住观念。

另一方面,石库门又绝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庭院,它是为适应现代都市的生活节奏、价值规律,并满足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房地产经营方式而产生的。石库门单元内部紧凑的房间布局体现出房屋价值的经济原则,让使用者能够以最经济的方式获得最大的使用效能。室内房间的设置,如亭子间,既为使用者提供了更多的使用面积,在人口不多、经济不够富裕的家庭更可以用来出租获利。从外部格局来说,石库门里弄的平面源于欧洲的联立式住宅,就像工厂的集体宿舍,或者是部队的成



图7 石库门屋顶俯瞰,罗小未、伍江:
《上海弄堂》,上海,上海美术出
版社,1997: 30。

排营房,是一种高密度住宅。建筑间距狭窄,缺少大面积室外空间(图7)。这种平面布置,能使昂贵的城市用地得到高效率的利用。

可以说,石库门里弄建筑的风格在中国建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适应了上海这座大都市人多地少的现实条件。而形成石库门这一特

殊空间的原因,正是由移民构成的上海人。

我们现在所说的“上海人”是一个文化意蕴超越地域观点的称呼。公元1291年上海设县,但上海只是华亭县的一个小镇,长期隶属松江府。当时的上海居民自我介绍时,不会说自己是“上海人”,只会说“鄙人祖籍华亭县”或“在下松江府上海县人”——按中国人的习惯,抬出一个比自己籍贯知名度更高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没有上海人。近现代意义上的上海人,是在1852年上海开埠以后随着上海向国际化城市的发展慢慢形成的。20世纪初问世的《上海乡土志》中“户口”一条言道:“同治间人丁共五十余万,三四十年来,侨寓日多,孳生日众,居民号称百万,实有八十余万……实由五方杂处,客籍多于土著。”^[6]1852年,上海人口为54万,至1949年3月达545万,其中移民的数额5倍于上海本地人,是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7]。

有研究者认为,上海吸引移民的原因主要有:

其一,对外贸易是近代上海经济发展的起点,围绕着对外贸易汇聚起许多新的人口,包括:买办;佣人、厨师、车夫、船夫等苦役;运输工人等等。1853年至1862年太平军和清军鏖战于苏、浙、皖地区,有十余万难民进入上海租界避难。战后部分人留居,或办商号、作坊,或受雇于人,于是苏浙皖籍人大增。19世纪50年代黄河决口,苏北地区一片泽